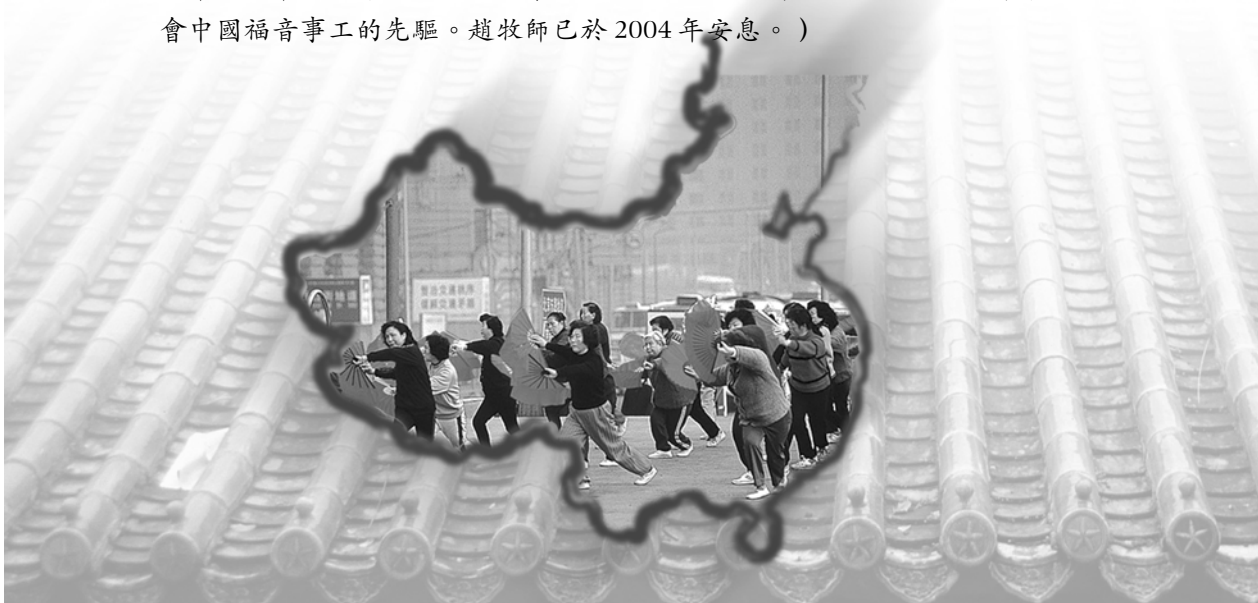


# 神呼召我回到中國人中 還福音的債

趙天恩

(編按：趙天恩牧師於1938年生於遼寧，1949年隨家人赴香港，1950年舉家遷往日本，1958年到美國讀大學。大部分都在國外成長，但神卻呼召他回到中國人中還福音的債。他沒有逃避，反而積極去尋求，最終成為海外華人教會中國福音事工的先驅。趙牧師已於2004年安息。)



我是14歲清楚得救信主，15歲奉獻傳道。1953年我奉獻時，神讓我看見：生命最有意義、最有價值的投資，就是傳福音。這是我從「生命投資」的角度去看工作的選擇；但其實不是我選擇神，而是神選擇我。當神呼召我時，我不得不跪下禱告說：「主啊！我將一生交給你使用，求你教導我、引導我前面的道路。阿們！」

當我回顧時發現：這30秒的奉獻禱告支配了我的一生！這個奉獻是一股相當強的力量，從那時起，神抓住了我。這個奉獻指導我讀大學、神學。就這樣，神帶領我從日本到美國賓州日內瓦大學讀希臘文、哲學和聖經(1958-1962)，然後再進入韋斯敏斯德(Westminster)神學院(1962-1964；1966-1967)，這是傳道呼召所帶來的行動。

就在神學二年級時，神清楚呼召我回到遠東向中國人傳福音。這是神在我奉獻之後，再一個具體

的呼召，我稱之為「向中國人傳福音的呼召」。

神既然呼召我回到遠東傳福音，我就開始面向遠東，又產生行動——回到遠東來看看。

那時我已經離開中國15年了(1949至1964年在日本及美國)，對中國人的想法、生活型態已經不太清楚了。

透過父親朋友的介紹，我到了台北關渡基督書院教授希臘文、拉丁文和保羅生平。回到台灣，我不但在教會講道，也參加學生的工作會，到山地佈道，那時背著行李走了8天，每天走五至八小時，發現山地信徒一年最多一、兩位傳道人去講道，所以我們去講道，必須從晚上8點聚會到晚上10點多，信徒非常渴慕。

那時我又發現台灣某些教會中有新派神學的影響力，福音派當中，又有一股反神學的潮流。此外很多大專畢業生大多數赴美學科技，很少讀神學回

國獻身於福音事工中；傳道人許多僅高中畢業，不能滿足知識分子信徒的需要。我就看見：台灣需要研究所程度的傳道人，需要呼召大專學生奉獻傳道。

在台灣事奉一年後，我回到美國(1965)，一面讀神學，一面反省。

我成立了「中國基督徒基督教研究團契」，和幾位學科學、神學的研究生討論：如何使中國人思想聖經化？因為我在台灣時發現，中國基督徒的思維方式，85-90%是中國人文思想(價值觀)，10%是聖經思想。這意思是說，包括傳道人，他們的思想形態與價值觀，仍是以中國文化的價值觀為主體，尚未基督化。

我們討論的結果是：在中國人中發展基督化思想，最好的方法是建立大學，透過教授，在大學界推動思想基督化；大學畢業生進入社會，影響社會，使中國社會、文化基督化。

但是，中國教會缺少成熟的基督徒思想家、教育家，又如何建立強而有力的基督教大學呢？我們看見必須先把神學教育建立起來，訓練神學思想人材，才能真正發展基督化大學教育。

最後決定先從神學教育開始。於是我們就號召同學去讀神學研究所，決定成立「中國神學研究院」。

在「推動神學教育」的過程中，我常常在思考：如何在中國思想(包括馬列主義思想)的大環境之內，發展合乎聖經的神學？如何在中國教會跟社會環境中建立有效的的神學教育？

在思考中我發現，唸神學時，好像只用一隻眼睛看世界，甚麼都是神學，都從上帝那兒往下看，人間平面的角度看得不大清楚——特別是在海外長大的我。所以我前往費城賓州大學東方研究所(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)研究中國歷史文化。歷史研究幫助我看事情從人的平面看，也從歷史角度看歷代思想、人文制度等等的發展。後來我發現，神學角度再加上歷史角度，看事就更具體了。因為我們若只從神學角度看，就看不見歷史中的相對性；但如果純從歷史而沒有神學角度看，又未能從神的救贖角度看歷史的意義。所以我後來就鼓勵歷史學者讀神學，又鼓勵讀神學的人去學歷史。我在研究1920年代的非基督教運動及其對教會的影

響(本色化的回應)時，更看見兩者兼具的重要性。

1977年，師母和我回到香港加入「中國神學研究院」，從事神學教育的工作，負責教務事工。1978年我在「中神」內成立「中國教會研究中心」。因為當時大陸正在開放中，世界各地教會都期待知道大陸教會的實情，想知道他們是否有機會參與福音工作。如果不了解大陸情況，我們又怎能向中國人傳福音呢？在甚麼層面上可以跟大陸的信徒建立主內關係，並參與傳福音？

這段經歷的重點說明：我們的宣教策略，甚至異象的發展，一方面是神的帶領，另一方面是客觀的研究幫助我們對時代的使命看得更清楚、更遠。

在香港工作的同時，我們也常常進入大陸從事福音事工。1979年開始，我們和大陸家庭教會取得聯繫，給他們送聖經，並作多方面的訪問及支持。藉著研究、出版和參與，我們對「中國福音化」的異象就逐漸形成了。

有了這個看見後，就進到第三個行動：大陸福音事工的參與。

接下來，我們就發展「空中神學」，通過環球廣播公司每日兩次作30分鐘的神學廣播，也經常進去大陸參與國內福音事工。

在香港九七問題浮現後，我們同工又看見：九七之後，甚至未到九七，大陸就會為福音開放大門，中國將成為有史以來最大的福音禾場，需要成千上萬的福音工人進去傳福音。我們既然共同看見這個異象，就在心中產生呼召感，於是決定在香港建立一所「中國宣道神學院」訓練人材參與大陸福音工作。

1982年台灣校園團契舉辦「第二屆青宣大會」，1985年舉辦「第三屆青宣大會」(在中原大學舉行)。大會請我主持大陸問題研討小組，但是在分組討論時，我發現同學們所問的問題，多半是基督教信仰與中國文化的問題。

當時我們的看見就是：香港宜作大陸福音工作，台灣宜發展文化基督化的事工。相信將來台灣基督徒對大陸的貢獻，也可能是在文化重建及神學教育方面。我們靠著神的恩典去落實中國福音化、教會國度化、文化基督化的三化異象。

(本文擷錄自趙天恩牧師著《扶我前行》，台北中福出版社，1998年，頁10-19。)